

# 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的 方法论与实践

## 导论

■ 黄贤强

跨域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简单说，那是结合跨学科领域和跨地域研究的两个元素，构成一个多方位和更全面的网络型研究方法。

跨域研究的元素之一，即跨学科领域研究，已为学术界所推崇，被认为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破除学术藩篱、强化学术研究深度和广度的良方。长久以来的传统学科，如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等，虽然仍是学术分科的标准，如现今很多大学的院系，仍然是以这种学术分类设置科系，但越来越多学界人士了解到，任何研究如果除了本身学术专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外，如果能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途径或理论精髓，往往能锦上添花，甚至得出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譬如史学家除了征引官方档案和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外，也逐渐接纳民间文书、口述历史、田野考察和访谈记录为历史材料，补充官方史料和文献的不足和平衡史观的偏差；又譬如很多大型的研究奖项，往往鼓励甚至是优先奖助跨学科的综合型研究计划，而非某一传统学科的研究个案。



跨域研究的另外一个元素，即跨地域研究，指的是超越传统的定个案研究或某地的全盘研究，而是多地点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以人物研究为例，许多人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在人生不同时期中分别在多个地方活动的人物的研究，或许是因为客观研究条件（如时间、经费）的限制和主观判断（如认为人物的活动重心和贡献重点）的因素而将研究锁定于某地、某区或某国的范围来论述，而忽略其他生活地区的重要性，如出生地的早年教育、成长岁月时期的地方知识、留学时期在国外生活经验对后来人生事业、决策判断，甚至是身份认同的影响。再如有关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除了研究特定庙宇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可以研究庙宇分香到其他地区，甚至是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这种信仰网络的研究就必须进行跨地域的田野考察才能深入探索。由于跨地域研究涉及耗时和复杂的多地点田野考察及零碎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资料收集过程，往往为一般学者所忽略。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类研究的成果也往往会有所创新或出人意表的发现。

跨学科领域和跨地域研究的结合，像是研究方法的连珠合璧，适当采行的话可以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当然，不是所有课题或研究主题都可以充分利用跨域研究方法来执行，但大部分的学术课题，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借用跨域研究方法进行探索。<sup>1</sup>有些研究课题，甚至很适合采用跨域研究方法，尤其是一些新近开拓的研究领域，不隶属于任何传统学科范畴内的研究，客家研究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学界普遍认为将“客家”作为学术课题研究，始于罗香林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sup>2</sup>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名称的出

<sup>1</sup> 强调跨域研究方法的研究专著和论集包括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台北：龙视界，2015）；黄贤强主编，《族群、历史与文化：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庆祝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上、下册（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王力坚，《清代文学跨域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2013）等。

<sup>2</sup>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希山书藏，1933）。

现，也是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的现象。此后有关客家的研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有兴趣从各自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其族群分布和特征、历史发展、生活情况、社会特质等。客家人的迁徙移殖、语言文学、经济生活、身份认同、政治参与、饮食文化、信仰习俗等，也是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深层和广泛的客家研究，正可以使用跨域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全方位或多视角的探索和论析。

现实里少有学者是全能型学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或对各门学科都了如指掌，所以跨学科领域研究，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个主要的学科训练为核心，再辅以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再者，也可以由一个团队来合作，成员各自发挥所长，再整合研究成果。《跨域研究客家文化》一书，就是一个团队研究的整合成果，其中一些篇章，明显是以某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切入；另外也有篇章是同一相关主题在不同地域的比较研究；再有的是结合学科和地域比较的综合研究，是跨域研究客家的典型实践。

本书第一辑“文化空间与展示客家”收录的四篇文章，都涉及不同地域的文化空间的比较，或从博物馆和文物馆，或从客家民居，或从主题别墅的比较，讨论客家文化如何被呈现和展演。颜夜明的〈身之为客亦为主——从茶阳会馆文物馆与大埔县博物馆的对比研究看新加坡客家人的多重身份认同〉，主要透过新加坡的一个客家文物馆与原乡的一个客家博物馆的对比，来凸显新加坡客家人的多重身份认同。作者选择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的文化实践作为切入点，一方面是由于该会馆在新加坡存在的历史悠久，并有强盛的社群领导及号召力，对在地客家身份认同的建构持续形成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该会馆独具匠心地设立了客家文物馆和客家文化研究室以保存和研究客家文化，此实践对于理解和传播客家文化及身份认同大有裨益。文章以中国大埔县博物馆为参照对象，具体从两馆的物质基础及核心认同两方面进行比较论述。尤其在核心认同方面，作者借鉴博物馆学的概念，以策展人为中心及联系点，讨



论其与资助人、展物及观众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平衡，以此探讨文化实践背后意欲体现及传播的“会馆—族群—国家”式的在地族群认同。相较于颜夜明以展馆的对比切入，姜雨葳的〈华侨故居的客家文化展示与传承——大埔光禄第与梅州洁养堂的比较研究〉则以两座客家民居为对照案例，从客家居住空间的视角来论述它们的文物价值和建筑美学标准。这两座大屋，即大埔的光禄第和梅州的洁养堂是中国粤东地区典型的客家围龙屋，分别为著名华侨张弼士和梁碧如在南洋发迹后回到原乡投资修建的大屋。这两座围龙屋也因主人的个人特性与奋斗经历成为立体化的人文空间，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及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功能。作者从建构特色、客商精神、故居变迁三个层面，将光禄第与洁养堂进行细致对比，以揭示两座围龙屋蕴含的客家文化、功能意义、主人个性风采，以及所要传达的客家精神。

分别坐落于新加坡、香港和福建永定的三座虎豹别墅，也是引人注目的文化空间，值得进行跨域比较研究。武琦的〈新加坡和永定两地虎豹别墅的比较研究〉结合文献与田野调查，对新加坡和永定两座别墅进行具体的考察及跨域比较。作者从两者不同的修建历史和功能谈起，而两座别墅所呈现出的建筑特色与文化意涵则是这篇文章的讨论重点，从中梳理出其建筑美学中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对华人传统文化的反映。作者从对这两座别墅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中，揭示出新加坡与永定两地在胡文虎心中不同的意涵。作为一位跨地域和跨行业的南洋华侨客商，别墅主人胡文虎在这两地虎豹别墅中分别展现不同的情怀，他也因应两地不同的文化环境而对别墅作出不同的设计。除了新加坡和永定外，胡文虎也曾在香港建筑了另一座虎豹别墅，王楠的〈新加坡和香港虎豹别墅历史沿革的比较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社会考察〉也是采用跨域研究的方法对新加坡与香港两处虎豹别墅的历史沿革进行文化解析。在对比研究中，两处历史建筑与当地文化社会政策的协商互动，以及新历史语境下建筑意义的重构诠释都被重新检视。其相似之处，暗合两个

港口城市现代化、都市化的大背景与发展动向；而互动与重构中的微妙差异，则成为战后两个海外华人聚集地不同社会本质的强力证词。在具体的对比研究之外，文章还探寻身兼文化景观和历史遗产等多重意义的虎豹别墅，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当下，及在后现代的华人社会中，如何展演和表述其特殊的“中国性”。

文化除了透过硬体的展馆和建筑呈现外，也透过软性的符号来实践。本书的第二辑“文化符号与唱写客家”包括两篇讨论客家山歌的论文和两篇以文字书写透析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文章。张倍瑜的〈新加坡客家山歌——一个客家文化符号的在地化与跨域化〉借鉴全球化理论<sup>3</sup>来探讨新加坡客家山歌从1950年代到现在的蜕变，其中涉及到早期人们如何通过山歌来进行对原乡的想像，新加坡建国时期客家山歌如何被禁声，到1980年代以来客属会馆如何促进客家山歌在全球舞台上的复兴等问题。作者认为山歌在新世纪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客家会馆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自己的定位。会馆是通过山歌的文化交流，努力把东南亚、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客家人的情谊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宣扬客家意识在全球舞台的重要性。文章也指出，当今会馆支持下的山歌班演唱的山歌，已经与一百多年前过番而来的山歌大相径庭。此刻新加坡的山歌班，是个有组织的艺术团体，他们在特定场合（剧院、公园等）表演，而不再是客家劳动人民隔山对唱的即兴活动。他们有专门的客家民歌作曲家谱曲作词，而这些唱词，与其说反映人民的劳动生活，不如说反映了当代客家人最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这种空间和内容的改变，是将客家山歌从一种民俗文化提升到舞台艺术的演进，作者希望由此探讨海外华人传统文化是如何应对变动中的社会，以及山歌这种文化符号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调整自己的位置并得以传承与发扬。程琛的〈客家山歌的渊源与传承——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客家山

<sup>3</sup>有关全球化理论，尤其是其文化层面的讨论，见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歌的形成与发展)则从具体的山歌创作来剖析山歌的在地化变异。作者以传统客家山歌在音律、调式和节奏所构建的框架,来分析由叶立天、黄有异等客家词曲作家所创作的客家山歌,并探究客家山歌这一传统文化是如何在本地衍化,慢慢形成具有东南亚特色的客家山歌,进而讨论这一文化结晶在新加坡的历史和政治方面起到的作用。

客家文化也可以透过文字的书写来洞察和传播。周思的〈新加坡客籍作家的族群及中国书写〉是从南洋土生客籍作家对族群和中国两方面的书写切入,分析新加坡客籍作家对本土与原乡、客家与中国的不同书写方式。作者分别以侧重族群书写的流军与侧重中国书写的淡莹为对照,讨论客家意识或泛华人意识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进而探究新加坡客籍作家内部存在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文章尝试突破新加坡本土的限制,将新加坡客籍作家创作置于华语语系文学<sup>4</sup>的范畴内进行思考,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考察东南亚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宋思颖和石冰若合撰的〈会馆会讯对客家文化的传播〉是以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出版的《茶阳之声》为例,分析会馆会讯内容对客家文化的体现形式和变化趋势。茶阳(大埔)会馆作为新加坡最主要的客家会馆之一,其会讯《茶阳之声》创办至今已近30年历史,为新加坡具有代表性的会馆会讯,也承担起对客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作者以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经典传播学理论——5W模式<sup>5</sup>,检视《茶阳之声》的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传

<sup>4</sup>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是近年来海外汉学研究中富有争议的新兴概念,它主要指中国之外的华语群体以及中国境内的非汉语群体所创作的文学。主要的倡议和议论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书美教授和耶鲁大学的石静远教授等。

<sup>5</sup> 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1948年发表的论文提出了研究传播行为过程的五个要素,即他的经典传播学理论——5W模式: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传播、传播效果如何(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

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五方面，分析该会讯对客家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辑“风水文化与客家意识”收录三篇相关主题的文章。雷天宇的〈从新加坡客家祠堂看客家风水文化——以嘉应五属义祠、丰永大三邑祠为例〉首先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明风水文化不是客家人的特有文化，但风水文化自唐末传入客家地区后便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由于受到了风水形势派<sup>6</sup>及客家地区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使得客家风水文化在中华风水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别样的风貌。而在海外移民的过程中，客家人也把这种原乡文化带到了异国他乡，运用于房屋建造的各个方面。但这种运用并不是直搬照抄，而是因地制宜的灵活取舍。作者在文章中不只介绍客家风水文化的特色及形成原因，更以新加坡双龙山嘉应五属义祠和丰永大三邑祠为例，具体分析新加坡客家人是如何在利用大风水（大自然环境）和设计小风水（小布局陈设）的实践过程中既继承传统，又灵活变通。

何颖舒的〈跨越重洋的神祇——以新加坡望海大伯公庙和宁化石壁客家公祠为例论跨国社会空间的文化双解〉，是以德国政治学家费斯特（Thomas Faist）提出的跨国社会空间理论<sup>7</sup>为架构，跨域比较研究望海大伯公庙与中国宁化石壁的客家公祠。作者认为通过在新加坡一个历史悠久的客家庙宇——望海大伯公庙的庙堂建设，

<sup>6</sup> 风水形势派又称形势宗，中国主要的风水学流派之一，相传由唐末的风水术士杨筠松所创。据载：“（形势派）其为说主于形势，源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其他拘忌，在所不论。”见（明）王祿，《青岩丛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页48。

<sup>7</sup> 费斯特（Thomas Faist）提出的跨国社会空间概念，即跨越多国边界的社会性与象征性的关系和网络。他的跨国社会空间是具有活力的社会过程，涉及到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本的积累、使用和效果。因此，他将移民体系视为一个打破疆界的过程，认为在跨国社会空间的形成中，包含五种行为主体的互相作用，即居住国政府、居住国公民和社会组织、输出国政府、输出国公民和社会组织以及跨国移民本身。有关理论参见 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5-46.



闽粤客家移民获得了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侨乡缩影和乡情慰藉；而通过回乡在宁化石壁兴建客家公祠，他们又将移民经验与财富资本由跨国合作方式带回侨乡。因此，这一庙堂网络形成了独特的跨国社会空间，其可能体现两种文化意义的形态。其一是以新加坡望海大伯公庙为例，建立于移民居住国，又身为母国宗教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居住国政府与移民的共同影响下，于母国传统上因地制宜并因时制宜地创新发展，生产出一种独特的、专属于新加坡客家移民的跨国经验。其二是以宁化石壁客家公祠为例，建立于母国，是母国客家传统与客家祖地的象征，又面向世界各地居住国移民，旨在推动母国政府、组织与居民和居住国政府、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专属于移民的跨国互动场域。

同样是借用政治学的理论为架构，陈凌子的〈无声博弈——权力结构与新加坡客家意识〉是通过新现实主义学派宗师，美国政治学家沃尔兹（Kenneth N. Waltz）所提出的“层次分析”（Level of Analysis）理论<sup>8</sup>，来探索权力结构中的博弈与互动对新加坡客家意识的影响。作者以权力结构的视角、层次分析的理论方法来观察和思考新加坡客家意识在后殖民时代的变化。作者认为在国际关系结构层次上，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须构建一个覆盖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认同，以立足于战后多变的地理政治格局，逐渐将忠诚度和归属感从族群转移至国家；在国家和社会层次上，强势的国家机器从种族、文化等政策上进一步强调共性、消解差异，国家机构取代客家会馆的多种职能，模糊了族群想象的边界，将族群性的客家意识转化为民族性的国家意识；在有影响力的个人层次上，极具政治资源的领袖通过官方、非官方的各种场合与方式，重新定位了宗乡会馆的职能与目标，进一步冲击新加坡的客家意识。由于受

---

<sup>8</sup> 沃尔兹（Kenneth N. Waltz, 1924–2013）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学派，即“新现实主义学派”（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学派”（Structural Realism）。他在1959年出版他的成名作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人、国家和战争：一个理论的分析），将引发战争的原因分为三个层次来论析。



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冲击和影响，客家族群的生态和客家意识的内容也因此产生变化。

第四辑“客家氏族与行业文化”收录两篇文章，分别讨论新加坡客家姓氏组织和早期客家人经营的白铁业。过去对新加坡客家宗亲会馆的研究比较偏向地缘的乡亲组织，赖郁如的〈新加坡客家姓氏组织〉是填补有关宗亲姓氏组织研究的不足。作者除了整理客家姓氏组织之历史，也归纳出新加坡客属姓氏团体的几个发展模式，包括多成立于1940和1950年代时期、多由原籍大埔的客家人发起和组成，以及多由清明祭祖会发轫而组织形成。为加深了解客家人姓氏结群的特点，作者还选择与福建人姓氏组织之情况作比较，最后发现在新加坡客家人的姓氏组织，多以祭拜祖先为凝聚平台，而福建姓氏组织，则多以祖神信仰为宗族活动焦点。吴静玲的〈新加坡白铁业的历史发展探析〉论述二十世纪新加坡客家人的其中一个传统行业。作者认为客家人的打铁传统、血缘与地缘的聚合作用，以及白铁业的产业特性使其成为新加坡客家人的族群产业之一。白铁业的发展曾一度随着橡胶业和黄梨罐头业等对白铁产品的大量需求而兴盛。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塑胶产品取代白铁产品，这门客家传统行业逐渐没落和消逝。

这十三篇论文并没有包涵新加坡客家文化研究的全部面向，但已经可以看到研究新加坡客家，不再局限于对新加坡一地的客家研究，而是扩及在地与他地或原乡的互动与比较，并可借助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文学等理论和方法，结合传统的史学、民俗信仰等知识，强化客家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如果将上述十三篇论文当作一个整体，就可代表跨域研究客家文化的部份成果。如果再追问什么是跨域研究？它的理论和方法又为何？这部论集可以找到简单的答案，那就是综合上述各个作者使用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乐理、华语语系、历史人类学田野、史学论述等理论方法完成的成果结晶。如果每一门学科及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颜色为代表的话，跨域研究就像一枚钻石，包涵并折射出鲜艳夺目的色



彩，但又无法厘清每种颜色的疆域，因为它们既有重叠，又有自我。但回过头来说，这个论集也只是跨域研究的试金石，跨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还需要很多具体实践和提炼。或者说，跨域研究永远无法准确定义和清楚定型，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者的不同学术背景为主体，兼采纳和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或许，它就像一代武界传奇人物李小龙曾经对自己的武术所作的带有哲理的诠释：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像水一般。当你将水倒入杯里，它就是杯；当你将水倒入水壶，它就是水壶；当你将它倒入茶壶，它就是茶壶。”<sup>9</sup> 跨域研究，或许也是这个道理。

---

<sup>9</sup>李小龙的原话为“... be formless, shapeless — like water.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you put it in a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Vimeo, “Bruce Lee, Be Water My Friend”, <https://vimeo.com/3191188>, 浏览日期：2015年5月11日。